

徐放集

[卷 四]



徐放集

[卷四]

◎风雨沧桑集

辽海出版社



徐放半身塑像 1999年南京美术学院李广裕塑



徐放在北京友谊医院探视胡风先生 1985 年 (张晓风摄)



前排左起：谢韬、路翎、徐放、贾植芳、孙铤、梅志、绿原、朱怀谷、罗飞、何满子
 后排左起：卢玉、李媛、任敏、杨友梅、耿庸、张禹、华田、欧阳庄、牛汉、鲁煤、
 化铁、曾卓、冀汧

1986年1月16日下午参加胡风追悼会后，在北京木樨地梅志寓所合影(周海婴 摄)



徐放与鲁琪、刘畅园在哈尔滨 1986 年



徐放与冀沅、牛汉在武汉黄鹤楼 1989 年



徐放与鲁藜、邹荻帆在北京诗酒文化会上 1987 年



徐放与李发模、野曼、贺敬之、杨山、纪鹏等在贵州全国诗歌讨论会上 1999年



徐放与公木、宋洁涵同志在沈阳东北大学



徐放和匡亚明教授在一起 1989 年在南京



徐放与老诗人臧克家在一起 1994年8月10日



徐放与贺敬之和董发全在一起 2001年6月在贺家



徐放的诗

胡 风

1944年，我住在重庆乡下。一天，一位戴着草帽的青年从城内步行了几十里路来看我。他从怀里拿出了一卷诗稿，要我给他看看。原来他是从沦亡的东北经过艰险的途程飘流了以万里计的祖国大地，来到了这古老的祖国西部的四川，寻求友谊，寻求斗争的道路，寻求安身立命的精神目标。

我读了他的诗稿，果然，跳跃着的是这样一个从亡国惨痛下面长程苦斗的、祖国儿子的心。在我的眼里出现了辽阔而富饶的东北大地，出现了在敌人统治下忍受着生活的困苦，但却坚强不屈地寻求活路的东北人民。

送别的时候，我望着他的似有所得的欢快姿态和走上生疏的道路毫不疑虑的健康的背影，不禁感到一种不能给予他一点有益的助力的、不安的惆怅。

这就是徐放。

那以来，经过了抗日战争后期的对国民党反动



压迫的沉闷的坚持，经过了解放战争时期的激烈的变化，迎来了祖国大地上朝阳普照的风光。徐放，他劳动，他学习，他工作，他斗争，他热切地但却谨慎地追随着历史步伐的前进而前进。但他在繁忙的劳动和组织性的工作中间，始终不能忘情的，是诗，是在诗形式里抒写他的爱憎和他的悲欢。他自己歌唱，他更鼓励年轻的伙伴们歌唱。他热情地希望有更多的年轻的歌者为洗除旧中国的污秽而歌唱，为迎接新中国灿烂的新生阳光而歌唱。在解放初期，他争取到了一点条件，热忱地编印了一套《现实诗丛》，向新中国的青年读者送去了虽然不厚但却是诚恳的礼品。

除写诗外，他还用纪初阳的笔名写了一些杂文和表现新生的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的报告。如他的笔名所表现的，他散布了祖国新生的阳光。

那以来，经过了反反复复的斗争，尤其是十年内乱的激烈变化，徐放当然不能不接受了严酷的考验。在别离了二十多年后的重逢中，知道他下放到环境艰苦的东北的乡下接受劳动锻炼。问到经过情况时，他只简单地回答：“放牛！学大寨！”

回答得这样简单，反而说明了那决不是这样简单。望着他和二十多年前几乎没有大变化的面容，不能不想到，他是承受住了考验的。

现在，他把他的诗选成了一个总集，要我看一



看。我匆匆地读过后，意外地发现了 he 走过的祖国大地有那么广阔；似乎 he 每走过一个地方，都要凭吊那个地方的历史经历，并赞赏它的现实动态，记录下了他的心声。对古老的故事的心声，对现实的人民奋斗经历的心声，总之是，一个中国大地的儿子的心声。

徐放是，禁不住要对古老的祖国的故事和残迹发生他的感应，通过他的感应来表现作为一个土地的儿子 he 内心的悲伤和希望。

他更禁不住对新生的祖国劳动人民的精神生活发生感动和向往，通过这些表现了他作为一个劳动人民的儿子的信仰和追求。

近年来，他更使他的信仰和追求拓大到了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礼赞上面，这更表现了徐放作为人民诗人的特色，国际主义的特色。

我还没有能力具体评价徐放的诗，只好凭我的印象介绍这个诗人。虽然是诗人的一斑，但却是我实感到的一斑。愿读者和他向过去告别的感情一同告别，和他对现实激动的感情一同激动，和他向未来追求的感情一同追求。愿读者从他诗里吸收能够有的真诚的情愫。

1984年5月5日

(原载《徐放诗选》)



我的诗路历程

——代序

1921年11月28日，我出生在辽宁省辽阳县城西北65华里的一个叫沟子沿村的地主家庭里。那正是“张大帅”当权时代。5岁时候，便开了蒙，上了家里设立的“私塾”，跟从在我们家乡那一带地方颇有声望的塾师吴乐天先生学习“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1928年6月4日，发生了“皇姑屯事件”，1928年12月29日，在张学良将军“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下，东北“易帜”，南北统一了，又上了村里的小学。这时候，跟倪溥泉先生学的是“青天白日满地红”和“牛大姐，马二哥，青草地，吃青草”之类。唱的则是“苏武留胡节不辱”和“日本小鬼真正顽，夺我旅顺大连湾”等等。此外，我喜欢的则是韩小窗先生编的那些“唱本”和长工董五叔教唱的民歌和小曲。用后来有些同志的说法，我本应上音乐学院，成为一个男低音歌手，但没有。不仅没有，而且从



1931年9月18日夜里沈阳北大营一声炮响，“天下马蹄乱了”，家从乡下搬进城，在小学老师孙世泽先生的熏陶下，竟“误入歧途”，走上了学习着写诗的道路，并迄无成就。

但学习着写诗，也使我从30年代末期便开始抒发出了我的那些反帝、反封建的，特别是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也正因为这样，我没有学好日文，而走上了“反满抗日”的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待到1942年，我刚刚出版了我的第一本诗集《南城草》，在东北又发生了一起“12·30”事件，由于遭到日伪的通缉，乃逃亡入关，进入已流亡到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1943年，我便参加了党的外围秘密组织“东北救亡总会”，在学校期间，则参加了南方局青委领导的秘密“读书会”（这时已学习并讨论过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等），是学生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和领导者。当时，在所谓“大后方”的高等学校中有一个“壁报拒检”运动，便是由我和一批进步同学发起的。1944年，我和老师陆侃如、冯沅君、赵纪彬、杨荣国、董每戡、叶丁易、姚雪垠，及同学刘黑枷等一起，组织并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为川北分会的理事和会刊《文学期刊》的编委（主编为陆侃如先生）。使我感到特别欣慰的是：由于分会的成立，我还联系了



一大批身在射洪的进步青年，如宋貂音、李天倪、王稻心、王怒安等，他们并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出版了《文学青年》杂志，在川北地区产生了很大反响。

在四川三台东北大学期间，可以说是我诗歌创作生涯中最为活跃和充实的一个时期，但至今还使我感到非常难过的是：我当时把这些作品曾编成一个题名为《明天的旅程》的集子，竟在由“五十年代出版社”送交国民党图书审查委员会审查后，被扣压、没收了，而且其中的大部分诗稿已不可再得。胡风先生曾答应为我这本集子写序，并把他的意见，在寄给我的一封长信中都表白了。他大致是说：我过去由于是生活、抗争在殖民地的高度黑暗统治压抑之下，同全新的革命的战斗生活（胡风先生在这里指的是由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或战斗气息隔离着，无法参加到有组织的全新的革命的战斗行列中来，可是又对伟大的祖国抱有热切的向往，对祖国过去的光荣有着深情的恋念，怀有一颗痛切的、深沉的忧国忧民之心，因此，便难免不在旧诗词中所常有的“忧患意识”和“兴亡之感”中寄托自己的那种忠愤义烈的、乃至凄伤悲楚的情怀。胡风先生曾明确地为我指出，说我的诗对于为人生总的战斗去向的达到点上，也许不一定能增加夺目的光彩和惊人的功绩；但因为这些诗是真情



的、诚恳的，不同于一般文字匠们的词藻堆砌；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这些诗里所表现的人生，最低可以给“大后方”污浊腐朽的生活之流里流进一些清新的气息，带进一些刺痛和不快，让那些混度生活、玩忽岁月、脑满肠肥的人们看看这种人生，知道中国还有一大半天地是在敌人的铁蹄之下呻吟，从而使他们清醒清醒，一扫残山剩水之间的颓废和污腐，还是会起到一定作用的。

还记得当时，在东北大学的诸多社团中，由我领导的“黑土地社”，是很富于战斗力的。这是因为，我们这个社团，是在革命的现实主义大旗之下团结起来、用文学形式同国民党进行战斗的社团，成员们都是在南方局青委的领导之下，不仅思想认识一致、步调一致，而且目标也一致。“黑土地社”的成员，没有一个不是先后都到了解放区的，没有谁不是党的忠实的信徒的。所以，当时“黑土地社”的许多师生，都被视为党的外围，并被监视着。有些同志都上了特务的黑名单，而我则被视为“奸伪小组组长”。我这一时期的诗作，可以《妈妈的黑手》和《起程的人》为代表。前者，我塑造的是一个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求生的、善良的农村劳动妇女性格；后者，是我送一位战友去解放区的“赠别”诗，用鲁煤同志的话讲，“难解难分的战友情肠，留连低回的惜别心绪，构